

兰金
回忆录



兰 金 回 忆 录

〔美〕卡尔·洛特·兰金 著
海 英 译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Karl Lott Rankin

CHINA ASSIGNMEN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1964

根据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译出

兰 金 回 忆 录

〔美〕卡尔·洛特·兰金 著

海 英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62,000

1975 年 5 月第 1 版 197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11171·103 定价: 0.85 元

内 部 发 行

译 者 的 话

卡尔·洛特·兰金于1949年8月由美国国务院指派，担任驻蒋帮广州总领事。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已横渡长江，南京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已被推翻。我大军继续向南方挺进，势如破竹，直逼广州，兰金迫于形势，不得不于同月底仓皇窜逃香港，并由美国国务院改任为美国驻香港总领事。1950年兰金被调往台北，任美国驻蒋帮的“公使衔代办”。1953年升为“大使”，至1958年1月任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离台。本书就是他在这段时期内活动的回忆录。

兰金是一个反共老手，据他自己供认，他来广州之前，二十多年的“外事工作”，主要是和“共产党打交道”，1947年他作为美国驻希腊的使节，就曾积极从事反共活动，镇压当时希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革命斗争。从这本回忆录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兰金这个反共反华小丑的可耻嘴脸。他在这将近八年的时间内，一再叫嚣“防御共产党的侵略”，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地为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出谋献策，妄图用大量经援、军援以至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等等为蒋帮输血打气，以实现美蒋反动统治集团“光复大陆”的迷梦。

革命的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势不可当。逆历史潮流而

动的反共反华小丑兰金之流的污蔑和攻击,无损于我们一根毫毛。社会主义新中国坚如磐石,屹立于世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兰金的这部回忆录中尽管充斥着谎言与诡辩,但仍无法掩盖它是一部失败的记录。例如他在记述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的对华政策时,就充分暴露了英美之间、美国统治集团之间以及美蒋主子与奴才之间的种种矛盾。这对于我们研究五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及其背景,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本书原名《出使中国》,现在的书名是我们改的。

1975年1月

目 录

序 言.....	1
第 一 章 中国.....	9
第 二 章 香港.....	19
第 三 章 台北.....	52
第 四 章 巩固.....	86
第 五 章 进展.....	110
第 六 章 停战.....	149
第 七 章 条约.....	172
第 八 章 问题.....	214
第 九 章 计划.....	259
第 十 章 扩充.....	279
第十一章 政策.....	307

序 言

本书概述了 1949 年中到 1958 年初我在广州、香港、台北以及几次短期回国期间所看到的美国对华关系的发展情况。这是我在国外抽空写成的,当时往往没有文件资料可资查阅。此外,我也不可能了解华盛顿幕后所发生的一切,国务院范围以外的,就更不是我可得而知之了。然而,我敢冒昧地说,我这八年有半的职守,使我对美国对华关系发展全貌的了解,并不亚于任何一个处理中国事务的美国人。

可以看到,本书的引文极大部分系摘自我执笔的函电。但这并不是说书内提出的一些见解,要人视为我的独创。对于中国问题,有许多人,不论是不是在美国政府里工作,都在沿着类似的路子进行思考、谈论和写作。也还有一些人,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出发,在以同样认真的态度进行探讨。不过,在我,广泛地收纳当时所写材料,则是叙述在国外先后任职期间所见事态演变最方便的方法,而且这样也不用叨光事后的聪明。其中有些摘录,不免危言耸听,或者显得过分地支持国民党中国这一边。我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我的主要目的,是要支持华盛顿那些和我同样认为中国 and 整个远东已处于紧要关头,认为美国必须采取一种积极主动的战略的人。把如此严重的局势,说得缓和一些,本可以使那些赞成撒手不管的人感到高兴。但是,考虑到美国的责任那么重大而广泛,我不能使那些我与之意见一致的人士处境被动,让别人说什么:“我们派在现场的人看来倒并不惊慌,而要你们着急什么?”

外交官的一项主要责任,就是向本国政府解释驻在国的政策

和主张。但在执行的时候，他往往做不到一个心平气和的观察者应做的那样，而是显得强烈地偏护驻在国。然而，今天的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已不再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更确切地说，当前的任务是确定如何利用既定的情况为我国利益服务。我们希望并且认为，我国的利益同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友好国家的最高利益是一致的。特别是在一个和平经常受到威胁的地区，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支持那些站在我们这边的人们，而在于我们怎样才能最有效地支持他们。共产党最惯用的一种伎俩，就是败坏我们朋友的声誉，企图使我们对于支持他们感到厌烦。在这方面，这种伎俩指望得到许多好心的或别有用心的美国人的帮助。不幸，时至今日，我们同胞中还有一小部分人，且为数不少，自从一度盛行孤立主义和中立的那个时期以来，思想上似乎还没有什么长进。

现设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其缺点是人所共知的。对于这些缺点，有一帮美国人、中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士，已加以精心推敲，确信不疑，乃至夸大其事、痛加诋毁；因此，除关系到我们援助计划的具体执行，或是涉及到美国的重大利益以外，我感到没有必要对这些指责再说些什么了。权衡得失，中华民国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美国和自由世界的一笔非常巨大的财富。中国很大一部分精华目前是在台湾，他们卓有见识，忠心耿耿地在从事工作。他们对于自己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缺点，象任何美国人一样，知之甚深。过多地评论这些缺点，只会授人口实，断章取义，而有损于美、中双方利益。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保持“中立”。

我们的实际任务，是使国民党中国的战略，保持尽可能的最大程度的同我国自身的战略一致。其军事建制究应具有多大的进攻能力，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似乎很大，但经过慎重诚恳的商讨通常是能合理妥协的。在经济方面，无论是短期的或长期的考虑，以及台湾这个海岛应该达到的自足自给程度，通过双方的耐心努力和从良好愿望出发，也能做到协调一致。甚至对于大陆中国的前

途这一重大问题,我们也能共同希望,最后把它从共产党手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美国的坚定不渝,为防止大规模公开冲突的爆发,为促成有朝一日将一个统一的中国带回国际大家庭的演变,提供了最大的希望。

对于本书中所陈述的意见,我负全部责任,虽然这些意见,只不过是对于我所信为美国两届政府的基本政策的一种阐述而已。国务院和它驻外代表之间的意见分歧,通常很自然地是出自一方较为强调国内政治因素,而另一方则比较着重外交官驻在国的形势。事实上,这些分歧通常只涉及到策略方面,特别是选择时机和侧重方向这两方面。一个官方驻外代表的职责,就是要直言不讳,汇报其驻在地的局势,并据此提出建议。至于这些建议能否采纳或应否采纳,则由上级根据国内情况和在政治上可行的范围内作出决定。驻外人员必须力求做到高高兴兴地接受这些决定。

当前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美国派在国外的外交和领事官员,只要执行由电传机或其他方式下达的命令就行,不容他们有斟酌的余地,也不容他们有影响政策的可能。不过,我们也听说过,有时一两个身在关键岗位而级别较低的外事部门官员,能够违背华盛顿的官方政策,改弦易辙,完全另行其事。当然,实际情况是介乎两者之间。外事部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能自行解决,就绝不要请示华盛顿。应该说,驻外官员对官方政策是熟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所处地位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决定应该如何按照有关政策处理某项具体问题和根据当时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向上级请示。他的责任有时很大。不犯一点错误是不可能的;使工作受到损失也是难免的;可以说这不外乎两个原因,不是让驻外官员了解最近政策发展情况不够,就是负责人事安排的官员择人不当。尽管会有这些风险,我们的制度同一些独裁主义国家通常所推行的制度相比,则要高明得多;那些国家的驻外代表,没有具体指示就不敢采取行动;也不会鼓励他们发表意见,提出建议。

驻外机构的负责官员，有广泛的自由就政策和其他事项向国务院坦率地提出意见。我听到过大使和其他外事官员奉命停止发表意见的事例。但是，我自己在三十四年外事工作中，却从未遇到这种情况，所以我的结论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当然，向国务院密抒己见同在记者面前口没遮拦，这两者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特别是在紧要关头对待一个微妙问题的时候。在几届政府中，我总是觉得受到鼓励，向国务院汇报时能畅谈自己对政策的看法，而不计我的观点是否显得有违既定的立场。

本书如果就某些有争论的问题，多引用一些著名人物的原话，无疑会使人读来更有兴趣。但这样做，自然会有人指责我断章取义；而更重要的是，这样会把注意力从问题转向个别人物。在本书里，如同在有关事件发生的时候一样，力求反映我所了解的有关事实，并做到既坦率地讨论问题，而又不针对任何个人。

为了着重说明历时多年而特别重要的一些问题，有些重复在所难免，甚至是必要的。但我力求把重复减少到说明问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所以只收集了公文和函电中一些较为重要的段落，选材时并顾及到毋需另加注解。后面几章，具体细节越来越少，这还是为了把枯燥乏味的重复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叙述的连贯性也就显得比较差了。谈到官员的访问和会议，不可避免地要一再涉及到差不多是相同的问题。也谈到各方面很多人士，尤其是美国方面的人士，这对激起每个人对中国问题的兴趣是需要的。可是，中国问题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当然，新的、意义重大的事态发展，在出现时，是需要解说和处理的。后面几章，就述及这些事态演变，但没有奢望把它们写成近乎完整无缺的记述，那需要写几部书才能做到。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对于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更好地了解中国，能起些微薄的作用，从而有助于证明继续采取积极支持我们所有的远东朋友的战略是正确的。其次的一个目的是要

说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协调美国在国外活动此项任务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美国政治活动的范围与规模的不断扩大，将继续在其驻外机构与人员的数量上反映出来，这是不幸的，但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协调这些活动的工作，近几年来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我认为自己的努力，对取得这些成果有些微小贡献，因此我这几年来对华盛顿提出的苛责，也许是可以见谅的。虽说机构庞大复杂是个累赘，但是美国在台湾的种种活动之间，及其与华盛顿各有关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于我在台北最后几年期间已达到极其令人满意的程度。不论在台北，或是在其他地方，我们的对外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已经开花结果。

自我出使中国任务结束以来已六年多了。1962年访台时，我满意地看到早年着手进行的许多经济、军事和社会事业方面的计划已经完成，或正在顺利地进行之中。台湾人口即将到达一千二百万，生活水平正节节上升。我高兴地看到蒋总统显然身体非常健康，精神也很饱满。他对中国的未来，一如既往，满怀信心。但是显而易见，基本问题依然存在。虽说我们在台湾的齐心协力取得了种种成就，但是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尽管也迭遭挫折，毕竟是个庞然大物，且其力量日益壮大，这就使人对自由世界能否真正在东亚守住阵地这一生死攸关问题，始终不能或释于怀。

自由世界在东南亚遭遇到的麻烦日益增多，这就重新突出了当前台湾和其他岛屿上强大的中国国民党军队的重大作用。毫无疑问，这支军队一直是阻止北平大规模公开干涉越南和其他地区的一个主要因素。在没有美军以接近朝鲜战争那样的规模进行干涉的情况下，赤色中国要是在其侧翼没有这一强有力的威胁，是很可能占领东南亚的大部分或是全部的。同1950年至1953年时期相比，今天的中国国民党部队，已配备得很好了，并且能随时投入战斗。

过去几年宣传得最广泛的事件之一，便是赤色中国与苏联的

摩擦不断增加。这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最后必将发生纠纷，不是没有预料到的，可是达到公开争吵的地步，则比一般的预计为早。历史上，俄国一直是中国的主要敌人。两千多年以前修建的长城，就是一道防御来自北面和西面的进攻的工事。自从十六世纪末叶以来，帝俄一直向东扩张，侵略中国，扩大疆土。外蒙脱离中国，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还是近在 1924 年的事情。因此，这是必然的，甚至一个共产党的中国，也会不甘心永远对莫斯科唯命是从。

根据共产党惯用的伎俩，苏联与赤色中国之间的分歧被说成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而事实上这种分歧乃是争权夺利的表现。莫斯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北平所提供的有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无疑地造成了双方关系的恶化，这是一个十足的讽刺。中共眼看自己在军事上、工业上在不断强大，就更加采取独立行动。与此同时，苏联人也意识到自己在养虎伤身^①，总有一天中国将成为他们的劲敌，同时也可能使他们卷入既危险而又不必要的冒险行动。苏联援助计划的实际中断，无疑已使共产党中国的经济 and 军事发展缓慢下来，这对中国的邻国和整个自由世界，都是比较有利的。

莫斯科与北平之间的纠纷是否已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形势？我认为没有。赤色中国在亚洲掀起了共产主义阴谋和侵略的旗帜，其贪婪程度至少不亚于俄国，而其轻举妄动，恐尤过之。因此，北平的领导人不仅远不是“非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且还煞费苦心，力图证明继承马克思衣钵的是他们，而不是俄国人。再说，赤色中国，尽管国内存在着严重弱点，但除了苏联，它仍然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只要大陆中国由掠夺成性的政权，特别是共产党政权统治，亚洲就不可能有和平的看法，依然是正确的。况且，莫斯科与北平极有可能象其他共产党国家那样，经过类似的激烈

^① 原文是创造一个科学怪人。——译者

的争吵之后，至少会在一段时间内弥合它们的分歧。它们一旦看到有机可乘，可以打击它们主要的共同敌人美国的时候，它们很可能是会这样做的。可是，也不容设想，苏联在着手埋葬我们的时候，竟就放弃了统治共产主义世界的目标。

然而在目前，原是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阴谋集团中出现的重大分裂，是明显的。显然，分裂的产生，并不是由于美国促使苏联的卫星国脱离莫斯科的任何努力，而主要是因为美国在希腊、朝鲜、福摩萨海峡、越南以及其他地方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从而预先制止了共产党的新胜利，并促成了这些赤色侵略者的内哄。但是，是铁板一块也罢，不是也罢，共产主义原来并不是一种国内的政治经济制度，而是国际上的大敌。只要象赤俄和赤色中国这样的巨人还在鼓吹共产主义，不论是它们各行其事，或是伙同进行，共产主义将继续是我们的大敌。

那末，莫斯科与北平之间的明显分裂，对美国的政策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我们按其传统意义来使用“政策”这个字眼，我们的政策就根本不会有什么改变。美国的对外政策在联合国宪章的序言中已作了很好的说明。为了维护联合国宪章一贯的宗旨和原则，美国的战略就必须坚持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抗共产党的威胁，直到有一天——天晓得是什么时候——我们的敌人以言行证明不再与我们为敌。关于政策与战略，就谈这些。

然而在策略方面，共产党国家之间即使是暂时的不团结，也能作为美国根据其自身的利益和整个自由世界的利益采取灵活行动提供机会。商品交换、文化交流、运输、信贷以及国际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可以根据形势需要，或给予鼓励，或加以限制。迄至目前为止，赤色中国只宜给它否定的待遇，和对东欧某些国家要显然不同。总之，为了美国的利益以及与我们最直接有关的友邦和盟国的利益，必须继续严格奉行相对利益的准则。在此过程中，我们决不应错过任何机会，以增强讨价还价的地位；而在这方面，美国却

一贯未加重视。

但无论如何，决不允许因为采取灵活的策略，而使我们的基本政策和战略受到损害，或使我们的敌友双方对于我们坚持基本政策和战略直至取得胜利这一决心的信念，有所削弱。我们必须坚持到底，直到那些妄图侵略的人认识到任何形式的侵略再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认识到联合国的和平原则和宗旨已规定了一项各国必须毫无保留地遵守的政策。“侵略”与“和平”，不用说，当然指的是世界各地通情达理的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意义。无论是莫斯科式的共产党，或是北平式的共产党，它们都在无止无休地向人们头脑里灌输这种思想：只要干涉共产党的扩张，那就是侵略；只要不进行这种干涉，和平就会来临。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务必对这些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

K · L · 兰金

1964年3月于雅典

第一章 中 国

(一)

我终究要到中国担任新职了，日期是 1949 年 7 月 9 日。

从缅因州北部钓鱼旅行回到我们夏天在南布里奇顿避暑的住所，看到国务院的来信。按早先给我的调令，我本该在归国度假后去耶路撒冷，而现在却要去接替杰克·卡伯特^①担任上海总领事。两年前，我曾被提名去上海任职，但当时由于我国驻希腊大使身患重病，他的副职又即将调走，国务院便派我回希腊，第三次去雅典任职，而改由卡伯特去上海。现在可轮到我去上海了。

国务院信中承认，中国局势相当动荡不定，但对未来，言词之间仍抱希望。实际上，国务院的信认为，在我到达之后局势也许很快就会稳定下来，尽管这样说似乎并没有什么恭维我的意思。不久前，中国共产党军队占领了上海，我们的领事馆人员，曾一度被海军部心怀不满的原来的雇员围困在办公大楼里，领事馆一位官员并遭到监禁和殴打。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更多的情况，当时美国报刊都曾作了专题报道。

但是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国务院要我把妻子留在美国。眼看八年中为解决这种问题得进行第三次斗争，很为之烦恼。当然，妻子不能跟随丈夫同去的情况是有的，但在外事部门并不多见；长期的阅历也说明了，除非异常特殊的情况，一般都是由有关人员自己决定的。倘不是为了孩子们的福利和紧急家务需要而决定暂时

^① 杰克是约翰的爱称。——译者

分开，外事官员的妻子总是和丈夫在一起的。我和波林商量了这个问题，给国务院的答复是：将立即回华盛顿，并希望能设法让我的妻子随我一起去远东。

对家庭的关心，使我想起几个月前收到的华盛顿一家储运公司的来信。当时我正在等待调令，可始终没有确切消息。这家公司通知我，不久要为我们搬家，并且提出可以使用它的起重搬运车。几天之后，又来信说，它刚刚获悉我的新工作岗位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抱歉不能冒险使用贵重的起重搬运车。这是我第一次得到的有关我的新职位的确切消息，国务院后来给我的信中证实了这一点，但并未对我表示象储运公司对它的起重搬运车那样的关心。

美国对中国应该怎么办？关于这一问题，华盛顿关心多而决心少。以最近中美关系为内容的不愉快的白皮书正在付印，给了我一份打字稿以便我在去远东途中阅看。司徒雷登大使即将离开南京返回美国。卡伯特总领事因病将和他偕行。在这期间，我们的大使馆正在广州按照一个精干的班子的规模建立起来，中国政府从南京撤退后已在那里设立了临时首都。广州总领事的职位，是我们在远东的一个年代最久的领事或外交官的职位，现正出缺。我的护照将写明我是派到广州去的；我将在那里等待共产党人到来，并说服他们让我继续前往上海。

我们飞越美国和太平洋，一路平安无事。在欧洲看到尽是战争创伤的城市之后，看到东京重建的规模，使我眼目为之一新。我们下一站是冲绳岛，1949年的格洛里亚小姐号台风^①刚刚袭过该岛，破坏很大。看来司徒雷登大使和卡伯特总领事，随时会从南京起飞前来，但是天气和出境手续把计划都给打乱了，所以无法肯定他们飞机到达的时间。他们在我们起飞前往香港以后的第二天到了冲绳岛。我们当天未能到达香港，被阻在马尼拉，第二天在暴风

^① 英美等国以女人名称作为第几号台风。——译者

雨中才飞抵这个英国直辖殖民地。

(二)

如果没有盛夏的酷暑、潮湿和暴雨，香港倒是个美好的地方。这个殖民地，在政治上固然是个时代的错误；但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说明在一个实行健全经济政策和高度法治的高效率的政府统治下，中国人的才智和勤奋能完成什么样的事业。当然，那时我们还想象不到我们不久就要回到香港度过愉快的、但是颇为紧张的一年。

在香港我首先访问了美国总领事馆。它设在这个殖民地最富丽堂皇的商业建筑，汇丰银行大楼的楼上已二十多年。我去时，有小小一群人挤在那里等电梯，我看很有可能第一批上去。电梯门打开了，把下楼的乘客吐了出来。但一霎眼，电梯又挤满了人，而我却仍在外边。并没有人推我或踩过我的脚，我可就是进不去。第二次我挤到离电梯不到三呎的地方；大概是我也稍许推了别人，电梯门就在我背后关上了，而没有让我吃闭门羹。

这是我在中国人群中第一次的经历。这些人大都矮小瘦弱，这在中国南方的所谓广东人中是常见的，他们的平均体重比我的一半重不了多少。那末，我怎么会推到我旁边而不觉得？后来我懂得了这里面的一些哲学和技巧。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一直苦于人口过多；一个中国人如果惯于被人赶上或挤出去，那就得挨饿，即使他们中间很少人能侈谈一句：“先请，亲爱的阿方斯！”^①但是，中国人本质上却是一个有礼貌的民族。他们使用背部轻巧而沉着的推挤办法，在人群中既不针对某人而又行之有效。在这次乘电梯的小小的冒险中，我注意到：尽管他们衣着多么朴素，但每个人都

^① 出自美国一漫画家所作“阿方斯和加斯顿”连环图画，画中这两个人遇事总是过分谦让，总要对方先请。——译者